

《史記》先秦世家悲劇命運之探討

劉榮傑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史記》世家描寫諸侯，大致描寫兩大族群：一類是西周建國以來所分封的諸侯國，另一類是西漢建國以來皇帝所分封的劉姓宗室以及協助漢高祖創業的元勳老臣。有三篇較為特殊，它們是〈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和〈外戚世家〉，司馬遷以其影響歷史的深度而給予評價。

本紀與世家的關係，既互相成為對方的起點，也成為對方的終結者。東周隨著昏君和血緣關係的逐漸淡薄，傳統制度式微，君臣上下之間衝突不斷，到了戰國時代，中原宛如人間煉獄，歷史舞台悲劇搬演不完。世家前十七篇就展現了各諸侯內部的變革過程和各國之間的關係，其中糾葛著矛盾衝突，最後以〈孔子世家〉作為終結。本文歸納先秦世家所展現的悲劇意識為1. 忍辱負重的復仇精神；2. 深情的宣洩和無奈的呼喚；3. 殉道精神；4. 悲劇意識的昇華。從中可以窺見司馬遷的悲劇意識並非停滯在傷感、憤恨的層面上，更積極的轉化為追求理想的力量。

《史記》先秦世家表現了先秦君臣間的矛盾衝突，司馬遷站在臣下的角度剖析中國歷史進展的規律，感觸良多，其中不乏義憤填膺之作，充分展示了悲劇英雄的人格特質，同時亦展現出在歷史的運作下，弱肉強食的一種無奈感，使得《史記》增添一股深沈的悲劇意識。

（關鍵詞：世家、衝突、悲劇意識、殉道精神、昇華）

壹、前言

悲劇主要是透過「衝突」來突顯人類在面對不可規避的力量時所表現的不屈，從而令悲劇人物在表面的失敗中獲得精神上的勝利。在衝突的過程中，悲劇人物所觸犯的蒙羞或可怖事件、及其所遭受的痛苦，引發悲劇人物或讀者（或觀眾）產生淨化而獲得知識；讀者或觀眾亦因恐懼及哀憐等悲劇情緒，在具備心理距離的環境下得以宣洩而獲得悲壯（或崇高）的美感經驗¹。悲劇由原始的一種祭祀型式發展為審美範疇上的一種藝術特徵，它的適用性可延伸到中西的各種文體。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和宇宙、人生難免會發生矛盾衝突，這是歷史進展的自然規律，無從規避，人類在歷史的舞台上時常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文學家或藝術家自然會將這些衝突的歷程表現在各種作品之中。如依上述的現代悲劇定義，古今中外具備悲劇藝術特徵的作品不計其數，因此探討作品中的悲劇特質亦為詮釋或鑑賞作品的一個重要而可行的途徑。

中國文學作品中展現衝突而能使作者或讀者、觀眾引發悲壯美感經驗，散布在神話、詩、詞、戲曲或小說中；此外，像《史記》雖是一部史書，然深具文學特質，其中展現著中華民族的奮鬥史，蘊藏著族群和作者司馬遷個人的衝突歷程，後人嘆為是一部無韻之《離騷》。從悲劇這個角度進行探討，亦可以發掘作品中的精髓。

貳、本紀與世家的關係

〈太史公自序〉云：「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中大致描寫了兩類族群：一類是西周建國以來所分封的諸侯國，如齊、魯、陳、宋等，也包括西周後期所封的國家，如鄭國以及戰國初期瓜分與篡舊國的一些國家，如韓、趙、魏、田齊等；另一類別則是西漢建國以來歷代皇帝所分封的劉氏宗室以及協助漢高祖創業的元勳老臣。除了上述兩類以外，有三篇較為特殊，它們是〈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和〈外戚世家〉。

世家的前半，寫法接近於本紀、較大的差別在於本紀中的篇什，在時間上是連續的、交替著，貫穿著中國發展歷程；世家的每一篇什在空間上是並立著，構成一個世界，它們從周圍支撐著本紀。本紀與世家的關係，可由〈陳杞世家〉的一段話窺出端倪：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

¹參見劉榮傑〈史記悲劇意識發微〉，收錄於2008 南台灣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

從上段所述，可見本紀與世家的源流相同，血緣關係濃厚。世家前十六國，他們的祖先也都是唐、虞之際的顯赫人物，雖然枝葉又枝葉地分列著，但諸世家的根本都出自於本紀，所以本紀與世家的性格十分相似。照理說，世家的增立應該是統治者溫暖的繁榮，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並非如此。鄭樵生先生於《司馬遷的世界》中說：

本紀的繼續既是貫穿人類鬥爭的縱的一面，則世家的並立便可說是綿亘於橫的另一面了。無論世家分列出發點是吳、齊、魯型也罷，韓、趙、魏型也罷，既然分裂了，便難免有排他相剋的命運。……只要是世界的中心不止一個，並且又沒有停止，那麼這個世界並立情況，是無法避免的。既然要想趨於單一，卻又要不斷向四方擴散，此乃這個世界的習慣。如果擴散了，其中心便會有許多的並立，結果，各中心的內容便難於決定，其形狀也容易歪斜²。因此，本紀與世家的關係，它們既互相成為對方的起點，也成為對方的終結者，打開《史記》世家的每一篇，便會發現各諸侯並立的激烈嚴厲現象，幾乎每一個欲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均會染上了鮮血，如〈宋微子世家〉：

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白，是為昭公。…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白。弟鮑革立，是為文公。

司馬遷對周朝的封建體制所衍發的矛盾衝突，在世家中的展現，主要是各諸侯間的消長，尤其是傳統禮制的淪喪更是世家諸篇中所描述的重點。在喋血的戰場中，司馬遷描述歷史人物的際遇，語帶悲涼；然在悲涼慷慨、無奈之外，又散發出一股抗爭的精神，堅持德政的理想理念，茲逐篇解析如下。

叁、《史記》先秦世家之悲劇命運

一、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世家最主要的悲劇人物是吳王夫差，以夫差為主軸，輔以與夫差產生衝突的越王勾踐和伍子胥。勾踐為了復國，歷盡滄桑；伍子胥則深藏了老臣忠心耿耿，那種無人理解、無可傾訴的痛苦和悲憤，全篇籠罩著強烈的悲劇性。吳王闔廬在位期間，勵精圖治，興霸名於諸侯，然在十九年伐越時，被越國的死士傷了手指，臨終前告訴其子夫差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夫差曰：「不敢。」

² 參見該書頁 105。

夫差肩負了復仇的使命，對越國展開了復仇計畫，三年之後乃報殺父之仇。這個過程中，引發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塑造了許多悲劇人物，如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吳王夫差失策步上悲局等，均成為後代戲曲的熱門素材。

吳王夫差之所以步上悲局，除了越王勾踐的苦心經營外，最主要是在於不聽忠言，不知利害，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通過吳王夫差的驕傲輕敵，不吸取歷史經驗，又誅殺良臣伍子胥，自毀長城，最後導致滅亡，給後人提供了慘痛、深刻的歷史教訓。其中記載了伍子胥兩段說辭：一段是夏代少康憑著「有田一成，有眾一旅」的基礎發展起來，終於滅掉了有過氏的史實；一段是引用「盤庚之誥」的「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的教訓。兩段話都足以發人深省，耐人尋味，可惜吳王闔廬置之不理。司馬遷寫伍子胥和吳王夫差的死，又有很強的悲劇性。伍子胥臨死前對人說：「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伍子胥並不是忍心希望吳國被滅掉，而是表現

了一個老臣高瞻遠瞻、忠心耿耿的那種無人理解、無可告訴的痛苦與悲憤；而夫差的命運也果真如伍子胥的預言料中。夫差臨死前說：「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越世家〉中更記載夫差「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這是一個暴戾者臨終的沉痛、愧悔之言，可惜為時已晚，吳國從此以後就成為歷史的名詞了。〈國語·楚語下〉載楚大夫藍尹亶回應子西的話：「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聽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卹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這段話道出了夫差成為悲劇人物的主要因素。

二、齊太公世家

〈齊太公世家〉記載了從齊太公呂尚始封到田和代齊的六百八十餘年的歷史，司馬遷在〈自序〉上說：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於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

很明顯的，司馬遷在處理齊世系時，是以數百年的興衰分段處理，全篇以齊君之繼承為縱軸，並以子嗣與群臣爭權奪利為橫軸，刻劃出一幅血腥的貴族鬥爭史，其中亦點綴著其他各諸侯的內鬥而互相輝映著。

太公去世後十五傳至齊，百餘年後到齊桓公建立霸業，是齊國發展的重要階段。可惜，桓公晚年多內寵，加上不聽管仲的臨終勸告，而信用易牙、開方、豎刀等人，以致三人專權，齊國遂陷於內亂而一蹶不起，自己也步上了悲局。〈齊世家〉載：

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

斂殯。

桓公有十多個兒子，後來繼位的有五個，無詭即位三個月就被國人殺了，沒有諡號。接著繼位的是孝公、昭公、懿公和惠公，整個傳位過程腥風血雨，一直到了惠公才稍為收斂。回顧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盛世，果真應驗了物極必反的歷史發展原則。

惠公去世，子頃公無野繼位，尚能守住封位，十七年後去世，由子靈公繼位，在處理太子的繼承問題不當，又引起了兒子們的內鬥，靈公病重時，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他為君，是為莊公。莊公和崔杼的續弦私通，引起崔杼的不滿，乃與宦官賈舉合謀報怨，莊公終被殺害，世家中生動地描述了這段過程：

乙亥，公問崔杼病，逐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

在這段的描述中，對於莊公步上悲局，司馬遷藉晏嬰的話，歸之為咎由自取。莊公死後，崔杼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就位後，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兩位左右相亦陷入明爭暗鬥中。後來崔杼有家亂，慶封乘機毀了崔杼的家，崔杼夫妻皆自縊而死，坐收漁翁之利，作了相國而獨攬大權。

慶封獨攬齊國大權，也象徵著呂家即將終結。後來齊國田、鮑、高、欒四大豪族合謀除去慶封後，齊國改權就墮入四大豪族之手，一直到齊簡公，寵任監止，引起田、監爭權，最後簡公被殺，田和專權，呂氏改權就走進歷史了！對於齊國呂氏政權的結局，司馬遷以晏嬰和齊景公的對話作預示：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三十二年，慧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慧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慧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齊太公世家〉）

在這裡，司馬遷指出了真正讓國家步上悲局的內在機制，但又有多少國君能克服這些內在機制呢！可悲的是，有的國君既不能克服自己的情欲，又不能反省，齊景公就是一典型，試觀〈齊世家〉所載：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泱泱齊國，後代子孫卻拱手讓給家臣，司馬遷在〈齊太公世家〉中，著重於呂氏

家族之傳遞過程，並積極鋪敘家族和君臣間錯縱複雜的糾葛，它不但展現了歷史發展的某些規律，同時也為這些規律的一再重覆，似乎也凸顯出一些無奈；不過從中我們亦可窺見司馬遷在這些爭權奪利的齊世族中所歸納出的一些治國的基本原則，那就是舉賢才和修善政，它們才是決定國家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

三、魯周公世家

武王克商以後，曾遍封功臣同姓親戚，周公旦被封於少昊古墟曲阜一帶，稱為魯公，後因留在京師佐理武王，輔佐成王不就封地，由其兒子伯禽代他到魯國接受策封。

魯君傳至武公時，武公親率長子括、幼子戲往西朝見周宣王，宣王喜歡戲，欲立戲為魯國的太子，周大夫樊仲山父勸諫宣王：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魯周公世家〉）

可惜宣王不聽，終立戲為魯國的太子，後來繼位為懿公，然而這也佈下了其悲慘的命運，並且亦可由此窺出禮在周朝的式微。

懿公雖受宣王器重而被立為魯君，然九年後，懿公兄括的兒子伯御即與魯人聯合殺掉懿公而自立為君，十一年後周宣公又殺了伯御而立伯御之弟稱為君，是為孝公。此後各諸侯中臣弑君、子弑父之悲劇屢見不鮮。孝公傳給惠公，惠公執政四十六年，去世後太子允尚小，由其庶夫人所生的長子息姑攝政，是為隱公，隱公亦為一悲劇型的人物。惠公為隱公娶婦於宋，宋女到了魯國，惠公見其美色乃奪作自己的妻子，而生下了太子允。隱公代理朝政間，受公子揮的陷害而導致被殺，太子允正式登位，是為桓公。然桓公亦未能善終，齊襄公私通桓公夫人，事發桓公勃然大怒；然齊襄公先發制人，派彭生殺了桓公。後來齊人亦殺了彭生以滅醜聞，一幕一幕的齷齪情節搬上魯史，《史記》不厭其煩的加以描述，對「周禮書在魯矣」不啻是一大反諷。

然而亂倫而立國君，導致悲劇之情事在魯國接連不斷，魯國統治者已完全喪失君德，傳統的禮樂教化更趨衰落。莊公死後，三個弟弟慶父、叔牙、季友爭權奪利，接連發生篡弑廢立之事，造成三桓執政的局面，導致魯國出現了「民不知君」的怪現象。哀公二十七年，「三桓攻公，公奔於衛」，至「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凡此種種，司馬遷皆沉痛言之，體現出他對德政的渴望和對魯國政治的惋惜。司馬遷於篇末感嘆道：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嫡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由此可以窺知，春秋時代魯國的悲劇的導因是在於禮義的式微，聯結司馬遷在〈本

紀〉中的治國理念，無怪乎要對魯國道德衰落、內亂不息的情況深深感慨，反諷的味道十分濃厚。

四、燕召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較之其他世家簡略，可能與燕地處北鄙邊遠，與中原諸國聘問往來較少，又未參加會盟；加之燕太子丹刺秦王政，秦滅燕，焚燕國史尤甚等因素有關。燕國宗族間與君臣間的矛盾衝突亦少，導致燕國滅亡的原因在於「燕外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但燕國卻能延續八、九百年，司馬遷歸功於召公實施德政的餘烈，全篇以強調德政的重要為主。

〈燕召公世家〉描述君臣間矛盾衝突情節的，只有兩處，一為「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另一為燕王噲用人不當，將政權讓位給宰相子之。三年之後，燕國大亂，太子平與將軍市被合謀除去子之，戰事拖延數月，死傷數萬。結果齊國乘機攻下了燕國，將軍市被與燕王噲均殉難，子之也被殺。二年後，燕國才立燕太子平為燕昭王。文中，司馬遷對燕昭王求士報仇的情節加以發揮，〈燕召公世家〉載：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燕國果然富足了，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樂毅為上將軍，聯合秦、楚和韓、趙、魏，一舉攻下了齊國，齊潛王逃奔國外，齊國除保有聊、莒、即墨三個地方外，其餘皆為燕國所併，長達六年之久。

可惜這種風光到了後來繼任國君就漸漸暗淡了！惠王不信任樂毅，而以騎劫取代之，結果齊國光復了以前的城池。到了今王喜，聽任宰相栗腹的計謀，不惜背盟而攻打趙國，結果差點被亡掉。大夫將渠力勸燕王：

「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蹙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召公世家〉）

本段可與《左傳》蹇叔哭師媲美。在本世家中，司馬遷一再提出任賢的重要性，燕王噲昏聩，貪圖虛名而讓國給子之，燕國幾乎滅亡；燕昭王屈身下士，舉賢任能，燕國遂強；惠王心胸狹窄，以騎劫取代樂毅，不聽賢臣之言，結果又幾乎步上亡國。司馬遷「為政在人」的思想觀在此又得到一個歷史佐證。

後來，六國抵擋不了強秦的吞噬，眼見秦兵已臨易水，禍且至燕。燕太子丹乃暗中奉養二十位壯士，並派荊軻進獻督亢的地圖給秦國，乘機襲擊刺殺秦王，演出了轟動歷史的荊軻刺秦故事，司馬遷亦於〈刺客列傳〉中塑造了一位壯烈的悲劇英雄。從燕昭王求士報仇和荊軻刺秦的描述中，多少透露了中國人積澱在心靈深處的「大仇不報，死不瞑目」的意志品格。在《史記》中格外重視復仇史事，

歌頌復仇英雄，這是悲劇意識在作祟；然司馬遷並不停留在這種氛圍下而沉淪，反而昇華為積極進取的力量。從他對歷史人物的評述即可窺出其深執的內心世界，他不僅為肩負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傳達了心聲，同時也開創了中國學術史上文化復仇的先例。

五、管蔡世家

〈管蔡世家〉是敘述周武王同母兄弟事蹟，是屬合傳性質。在本世家中，司馬遷說明了分封制對血緣關係的依賴及在當時具有籓屏周室的積極意義。內容主要是記載了蔡國、曹國史事。在這兩封國的繼承中，仍然擺脫不了「德行暴亡」的歷史發展規律。

管、蔡反對周公而作亂，司馬遷不予肯定，然對於蔡叔度的兒子胡卻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乃舉以為魯卿士，結果「魯國治」，所以得復封於蔡，得以延續祭祀，司馬遷特別稱許他。在蔡國諸君的延承中，除了哀侯和繆侯言行不當，導致誤國外，並無其他重大矛盾衝突情事。一直傳到了景侯，因為亂倫結果導致國家步上危亡的大導線。〈管蔡世家〉載：

四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當時，臣殺君、子弑父之事屢見不鮮，如靈侯二年，楚公子圍亦弑其王郟敖而自立，是為靈王。而反諷的是，楚靈王卻以下犯上之名滅了陳、蔡。〈管蔡世家〉載：

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為蔡公。

三年之後，楚公子弃疾也殺了其君靈王而代立，是為平王。這是個殘酷的時代，司馬遷無情地掀出這些貴族的醜陋本質，不幸的是這些事件一直在歷史的舞台上重演，積澱已深，想避免重蹈覆轍，那又談何容易呢？

周武王的弟弟曹叔振鐸封於曹，曹為小國，〈管蔡世家〉中主要是列其世系，然其中載宗室間為了爭取君位而互相殘殺亦有四處：

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等傳位到伯陽，國勢已迫黃昏，〈管蔡世家〉以載曹國之夢兆為曹國的滅亡作預測：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

後來，伯陽果然於田弋中結識野人公孫彊，信寵他，聽從他的策略背晉而侵宋，

結果被宋滅掉而亡其祖祀。

司馬遷於篇末評述道：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換言之，「德政」才是治國長久之計，然而周朝這些諸侯中，又有多少國君可以堅持這個理念？在情感與理智的矛盾衝突中，理智大多數被情感克服了，所以歷史興衰的曲線圖還是會繼續延伸。

六、陳杞世家

〈陳杞世家〉概括周異姓諸侯，與前篇〈管蔡世家〉敘周武王兄弟十人一樣，以點敘世次為主而照覽全局變化的篇章，重點寫陳、杞二國史事（陳是虞舜的後代，杞是夏禹的後代）。陳國的世系發展中，由陳厲公開始引發矛盾衝突。陳厲公是桓公的弟弟，陳桓公去世後，蔡國人（厲公的母親是蔡國人）殺公子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擁護厲公，由此奠下日後的復仇情節：

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陳杞世家〉）

三傳至杵臼，是為宣公。宣公為了立寵妃之子款乃殺太子禦寇，款亦順利的繼位，是為穆公，穆公之子為靈公。靈公性好魚色，結果引發了內亂：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廡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同上）

楚莊王於是乘機殺了夏徵舒，將陳併為楚國一縣，後來楚莊王接受申叔的力勸，方又立午為陳國的國君，是為成公，從此就被長期處在楚國的威嚇下，最後被楚惠王所滅。

至於杞東樓公，夏禹的苗裔，周武王克服商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祀。司馬遷僅就其世系作交待，並說「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但其亡國卻比陳晚三十四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家中司馬遷在天人關係的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矛盾，文中圍繞著田敬仲完的出生記載了三段預言：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史記》的哲學思想基本上反迷信、反天道；但是《史記》中所載之卜筮、預言、夢兆之事亦甚多，流露出司馬遷在天人觀上的矛盾。這種現象除了反映先秦時代人們對天人關係問題進行考察的歷史軌跡外，也反映了一位悲劇人物對宇宙基本問題進行理性探索過程中的困惑。

七、衛康叔世家

衛康叔，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周武王推翻紂王以後，以殷的遺民封給紂王的兒子武庚，然在武王崩逝後，管叔、蔡叔聯合武庚作亂，周公旦興兵東征，殺了武庚、管叔，放逐蔡叔，乃將原封給武庚之遺民改封給衛康叔，位於黃河和淇水之間的殷商故墟上。

文章一開始，便依《尚書》之〈康誥〉、〈酒誥〉、〈梓材〉諸篇及〈序〉記載周公申告衛康叔以開宗明義：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本篇以此為契機，從「德」與「色」兩方面總結封建體制興亡的歷史教訓，事實上，周及分封的國君中很少能逃脫這條歷史發展規律，它是掌控著興亡的主要機制。

衛康叔果不負周公之告誡，「能和集其民，民大說。」但傳到了武公即發生「武公弑兄」以自立，然武公即位後尚能「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二傳到了桓公，內亂情事就開始發酵了。從此以後，衛國常為立君之事而宮中互相殘殺，失敗的國君則流亡到異國去。傳到了惠公的兒子懿公，荒淫侈靡，結果翟人乘機侵入衛國，殺了懿公。文公即位後，「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頗有中興之勢。可惜文公之後成公卻周旋在晉的內亂中，君臣間理念不一，因而在成公、定公、獻公、殤公年間，君臣常因公私事矛盾衝突而互相廝殺攻訐，導致國勢不振。在司馬遷的筆下，衛國臣下尚保存傳統之禮制觀，和在位的宗室恰成強烈的對比：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衛康叔世家〉）

可見，即使有優質文化的地區，亦抵擋不了亂世的政治摧殘，無形中展現了司馬遷在天人的關係上的矛盾和困惑。

對於衛國流治者荒淫好色，導致禍亂數世，司馬遷感慨道：

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衛康叔世家〉）

對於衛國這種亂象，司馬遷從文章的結構上作回環呼應和對比映對，寄寓了對歷史興亡的感嘆。蘇轍〈古史〉亦評述道：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伋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三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³

事實上，在春秋、戰國之際，亡國亂君之事何止發生在衛國，祇是衛國之始祖康叔在接愛封地時，周公旦殷懇告誡，布之方冊，繼之以孔子及其弟子子路、高柴等人輔佐，然仍不免要步上悲局，陷於大時代的洪流中，無怪乎司馬遷感觸深刻。時代的運轉，豈為少數有志之士所能扭轉？

八、宋微子世家

微子開是商紂的庶兄，周滅商以後，周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然在周成王時和管叔、蔡叔起來作亂，周公東征，殺了武庚，乃以微子取代武庚，並立國於宋。

微子、比干和箕子是孔子所稱讚的「殷有三仁」，箕子和比干也是紂王的親戚，對於紂王的昏昧荒淫，他們屢諫，紂王卻置之不理，到最後比干力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離國出亡。在〈宋微子世家〉中，司馬遷藉機闡述治國的一些基本原則：

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可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沉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

對於商紂這種暴行，微子已看出亡象，但卻掙扎在是否該為這種政權付出生命的代價，所以請教太師箕子和少師比干，結果太師給予微子一個正確的方向：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蕃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在太師的力勸下，微子終於離紂而去，並表明了君臣父子相處之道：

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商紂終於如微子、箕子之所料，步上了亡國之途。

周武王克服商紂後，向箕子請教治國之道，箕子回答道：

在昔絲陘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斃。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宋微子世家〉）

³ 引見凌稚隆《史記評林》卷三十七。

這些治國之道，司馬遷巨細靡遺的加以記載，實際上就是在反映司馬理想中的德治，對於箕子理念的未能實現，司馬遷也以感性的語調寄予同情：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僇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同上）

微子代替武庚立國於宋以後，由於素來仁慈賢明，因此深愛殷朝遺民愛戴。後來宋國在傳承的過程中，亦見爭立國君之事，由宋湣公的兒子鮒祀弑其叔叔煬公而自立為君開端，嗣後父子或君臣間之爭權奪利屢見不鮮，傳到了君偃，終於步上亡國的命運：

（君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宋微子世家〉）

本篇總結了昏主亡國的歷史教訓，同時也指出了為君之道和君德、臣德等問題，表現了司馬遷對理想君臣關係的嚮往和渴求。

九、晉世家

晉的始祖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幼弟，被封於唐，叔虞之子燮父遷到晉水旁，國號乃改稱晉。

〈晉世家〉中記載晉文公的事跡最為詳備，幾乎占了全篇的一半。晉是春秋時代唯一以宗國稱霸的霸主，其霸業綿延二百多年，但〈晉世家〉也最能凸顯出春秋時代的亂象，以及各諸侯間為了爭權奪利，大家明爭暗鬥，國君間或君臣間往往存在著許多矛盾衝突，然而到最後仍然遷就於政治現實，許多人物就在矛盾衝突中流為犧牲品而成為悲劇人物。

晉國內部的矛盾衝突肇始於殤叔在其兄穆侯逝世後自立為侯，太子仇出奔，四年後率領黨徒襲擊殤叔而自立，是為文侯。文侯死後昭侯繼位，並封文侯的幼弟成師桓叔於曲沃，此後晉國便展開一系列的權位爭奪戰。針對晉王室這一段矛盾衝途歷程，〈晉世家〉載：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對於許多預料中的事情，司馬遷常引卜辭以敘述之，從《史記》中反迷信的立場，司馬遷不可能去相信占卜之可信度；但運用在寫作技巧上，卻可加強一件事實的必然性，同時也表現出些許的無奈感！

晉惠公繼位後，為了鞏固地位，不惜內耗，排除異己，誅殺里克。里克臨終前和惠公的一段對話揭示了春秋時候君臣間的錯綜複雜關係：

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晉世家〉）

在君臣間一旦發生矛盾衝突時，在當時臣屬仍居下風，步上悲劇是必然的，里克倒是十分認命。慶鄭對惠公的背信食言則深不以為然，亦引發言辭上的衝突。晉被秦擊敗後，晉惠公遷怒慶鄭，結果慶鄭被處死。對於晉惠公「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之行徑，司馬遷引傳述在文章中預示他的結局：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晉世家〉）

在描述晉惠公時，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尊禮守信才是安身立命的準則，也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這個理念在藉由對晉文公極力表彰而凸顯出來。

晉文公重耳是晉獻公的兒子，他是春秋期間宮內鬥爭禍及太子的典型代表。受到驪姬的排斥與陷害，他逃難於狄、衛、齊、宋、鄭、楚、秦之間，一共在外流亡十九年才回到晉國繼位，年已六十二。歷經了這段坎坷的旅程，即位後晉文公仍能奮發進取，對內修德施惠，對外尊王攘夷，奠下了晉國稱霸的基礎。晉文公之所以能奠定霸局，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勝利，毋寧說是道義上的成功，是以德勝、禮勝的結局，所以司馬遷由衷地讚道：「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晉文公代表了司馬遷心目中的理想國君；同時也表達了司馬遷的某種人生哲學觀：只有意志堅強，不向命運低頭，敢於在逆境中搏擊的人，方可能成大事、立大業；反之，舒適的環境只能毀滅人的理想，消磨人的意志。宋人羅大經說：

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灶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⁴
這個理念與《史記》中所傳達的意旨是一致的。

文公建立霸業以後，襄、靈、成、景、厲公諸君繼立，晉的霸業時續時斷，到了悼公力圖復霸，稍見起色，但平公繼位後卻後繼乏力，大權遂漸旁落於六卿之手。吳國延陵季子出使到晉國時即窺出了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即將奪晉的端倪，齊相晏嬰出使到晉，曾與叔嚮交談，叔嚮說：

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晉世家〉）

果然，傳到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晉國終於走進歷史。司馬遷在〈晉世家〉論贊中感慨道：

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

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尊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這段論贊具體而懇切地道出了諸侯國興亡的內在機制，明君尚且無法面面俱到，何況那些昏君呢？無怪乎悲劇如轉輪般在歷史的縱深上不停地運轉。

⁴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引見韓兆琦《史記題評》頁159。

十、楚世家

〈楚世家〉即以東周為主要背景，歷述楚君如何在這充滿血腥的歷史舞台上力圖生存，其中不乏推展德政的君主，如楚莊王、楚昭王；然亦有淫亂信讒的國君，如楚靈王、楚懷王、頃襄王，最後終於抵擋不了蠶食鯨吞的秦國而走入歷史。在〈楚世家〉中，司馬遷除了著重於春秋戰國時代發展的必然性，筆端帶著幾許的無奈；在總結楚國的興衰時，他強調了德政的重要性。

楚君在傳承的過程中，亦和其他諸侯一樣，父子、叔侄、兄弟間爭權奪利，甚而互相殘殺之事屢見不鮮，搬演著一齣齣的小宮廷悲劇，如：熊霜在位六年而死，三位弟弟互相殘殺。蚡冒在位十七年而死，弟弟熊通殺了蚡冒的兒子取而代之；成王熊暉弒其兄莊敖而代立，成王的兒子商臣被廢太子後即舉兵謀反，逼成王自縊。康王在位十五年而死，子員即位，是為郟敖，然康王的四位弟弟一公子圍、子比、子皙、弃疾即展開了君位的爭奪戰，後來公子圍殺了郟敖的兒子而自立為靈王。靈王在位第十二年，觀從入宮殺了靈王太子祿，而立子比為王，靈王逃亡。子比後來又被弃疾逼迫自殺，弃疾即位，是為平王。平王以後，楚國君位的傳承才恢復平靜。

上述那些爭權奪利的國君，大多不得善終，他們除了和自己的宗族產生衝突外，也因驕縱、聽信讒言等人格缺失因素，導致君臣上下之間的不合，釀造了許多悲劇人物。如楚靈王驕縱，多行不義，當他拘囚齊國大夫慶封數落其不是時，慶封反唇相譏：「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靈王立即派弃疾殺之。後來弃疾詐騙靈王而繼立，是為平王，雖有作為，但為色所迷，甚至聽信讒言，結果犧牲了忠臣伍奢父子，造成了伍奢之子伍員復仇的一段悲壯情節，最後楚平王遭伍員鞭屍。司馬遷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伍員的人格特質，詳載於〈伍子胥列傳〉。針對靈王、平王、司馬遷於篇末評述道：

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楚世家〉）

他把楚國的興衰納入道德操行的範疇。此外，司馬遷更藉楚君爭權的過程論述治國之道：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楚世家〉）

再觀他對楚昭王的評述。楚昭王是楚國的中興之主，勇於自責，堅持死後讓位於

弟，又拒絕移病於將相，孔子在陳聞風讚嘆道：「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楚世家〉）凡此，均可窺見司馬遷在描述春秋戰國各諸侯的亂象時，儒家倫常思想這把尺還是很堅定的，甚至還搬出天意來維護這套倫常觀：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楚世家〉）

這一段是引述王孫滿反對楚莊王問鼎的回話，理念和司馬遷是一致的。換言之，在歷史的進展中，雖然成敗是由許多因素所造成的，但「德政」的堅持則是必須的，否則將無法永常，這是司馬遷在評述領導人物時由悲劇意識所散發出的一種昇華思想。

楚國到了戰國末期，情勢就轉變了。在歷代君臣的慘淡經營下，雖有起有落，但在當時畢竟還是一個強國，然卻禁不起秦國弱肉強食的各種技倆，逐年被秦國的謀臣張儀所分化；再加上楚國出現了一位昏君－懷王，使得楚國被張儀玩弄在掌股間。張儀充分掌握了懷王的人格缺失－寵信讒臣靳尚，數度誘騙得逞，氣得賢臣屈原為之頓足。可惜忠言逆耳，當懷王清醒時，為時已晚，君臣均步上悲局：一個堅持理念，懷石投汨羅江；一個成為客死異鄉的君魂。更可悲的是，懷王之子頃襄王繼位時，還昧於當時局勢，還在與虎謀皮，復又轉與齊、韓等國重新合從以攻伐秦國，甚至有圖周室的企圖。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來不及捕蟬，暴秦已逐漸展開吞食的動作，楚國也處在強弩之末，頃襄王病死後，楚國很快地就走入歷史了。

如果參閱〈秦本紀〉、〈伍子胥列傳〉、〈屈原列傳〉、〈春申君列傳〉，我們不難發現，楚國的興衰，除了〈楚世家〉所凸顯的「德政」因素外，昧於局勢，亦是一個重大因素，然這些因素司馬遷則分散於上述等其他列傳中，從不同的角度來詮釋戰國終結於秦朝的這個必然的歷史規律。

十一、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勾踐世家〉主要是記載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後，忍辱發憤，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方面壯大自己，一方面麻痺、分化敵人，最後時機成熟一舉滅掉吳國成為霸主的過程。司馬遷通過勾踐的復國舉動贊揚忍辱奮鬥、慷慨復仇的精神，這是悲劇意識的昇華，也是《史記》中屢屢出現的主題之一。

越王勾踐失敗後，委國政於文種，而依范蠡、大夫柘稽的規畫，為質於吳，舉國同時心協力，共赴國難。七年之後，勾踐拊循其士民，準備報仇。大夫逢同告誡越王：

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但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天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

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就是照這個路線，不僅指揮著越國日益走向勝利，同時也引導著吳國一天天走向滅亡。不久，他們又與吳國內奸伯嚭裡應外合，除掉了吳國忠臣伍子胥，從此吳王日益昏庸，最後趁著吳王夫差北上黃池與晉國爭霸的時機，一舉攻下吳國的首都，迫使吳王倒過來向越國求和。幾年之後，越國終於徹底滅掉了吳國。

司馬遷對越王勾踐這種忍辱發憤的精神，是極盡歌頌的，對於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這對冤家為了復仇所作出的努力是給與肯定的：一為報父仇，一為報國仇。司馬遷用那采椽之筆，在吳、越世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這兩篇世家中，一再暗示悲劇的根源在那兒，但在歷史的發展的縱深中，這又是無可避免。能勇敢面對悲憤而積極克服，扭轉乾坤，這才是司馬遷所讚揚的。所以蘊藏在司馬遷的內心深處，還是積極的儒道精神，他與唐代詩人李白詩〈越中覽古〉：「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唯有鷓鴣飛。」所展現的理趣是全然不同的，這是悲劇意識的昇華。

司馬遷對於越王勾踐的忍辱負重精神給予歌頌，但對其勝利之後的背信棄義、殘害功臣則表現了極大的憎惡，並對這種殘酷的歷史規律表現了深深的慨嘆。一代賢臣文種，為其主人委曲求全，最後卻受讒淪落自殺的命運；范蠡則有先見之明，滅吳後即飄然離去。他寫信給文種，信中提及「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可惜文種的領會遲了一步，步上了這條不可避免的歷史規律。范蠡具有先見之明，司馬遷對他著墨甚多，從他對范蠡的描述，可以窺出司馬遷也歸納了脫離歷史悲劇命運的一個模式，那就是用道家思想來武裝自己。這種人物在《史記》中屢見不鮮，如〈留侯世家〉中的張良就是一個典型，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即評述韓信不懂得道家謙讓之道，才令自己步上悲局。但范蠡聰明一世，自己的子女命運卻不見得可以扭轉⁵，這也充分展現了悲劇命運的不可抗拒性。

十二、鄭世家

鄭國在春秋時代，介於晉、楚兩大國之間，非得罪於晉，即得罪於楚，以小事大，左支右絀，凡交戰令盟，靡役不從，興建師動眾，疲於奔命，所以發生在鄭的矛盾衝突頻繁，可謂內憂外患。鄭世家傳承二十三世，公元前 375 年被韓所滅。

鄭莊公在位期間，鄭國的大權掌握在大夫手上，在君不君、臣不臣的亂世裡，是是非非，許多大夫常常在不明究理之下淪為犧牲品，只要捲入君權鬥爭，隨時都會有悲劇發生。到了鄭襄公，亦周旋於楚、晉間，左支右絀。襄公八年三月終於引起楚軍壓境，襄公以鄭都城向楚王投降，肉袒牽羊親迎楚王，說道：

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

⁵ 史珥《四史剿統》載：「（范蠡）棄子驅以試其智，何足貴哉？」引見含韓兆琦《史記題評》頁 165。

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

一國之君淪落到這種局面，真是情何以堪！楚莊王和群臣皆不忍，率兵而去。晉聞楚伐鄭軍，派兵前來接應時，鄭已投降，楚乃回頭狙擊晉軍，鄭反而幫助楚兵，大破晉軍於河上，此舉引發晉國於襄公十年來討伐鄭國，所以鄭國的悲境是一種必然性。鄭悼公、鄭成公、鄭釐公諸王繼立時，就處於兩面不是人的場面，疲於奔命；加上卿大夫專權，朝政日益惡化。鄭國宰相子駟甚至還毒死了釐公，乃立釐公之子嘉（那時才五歲）即位，是為鄭簡公，幸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子產，方能力挽狂瀾，勉強地周旋在晉、楚間。聲公五年，子產逝世，縱使鄭人以隆重之禮來感念他的德政，但終究挽回不了小國的悲境。三家分晉後，韓終於併吞了鄭國。

司馬遷於篇末論贊道：「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其中即點出了鄭國所發生的矛盾衝突的根源；然在傳統價值體系崩潰時，每個人的命運卻很難在掌控之中，無怪乎司馬遷所說的：「守節如苟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多少亦捲入了他個人的身世之感。

十三、趙世家

〈趙世家〉、〈魏世家〉和〈韓世家〉三篇描述了春秋期間晉國六卿專政和三家分晉的史事以及戰國期間三晉由盛而衰，終被秦滅亡的歷史變化，其中以〈趙世家〉所載較為詳盡。

在〈趙世家〉中，司馬遷所極力凸顯的有兩個重點：一為「士為知己死」的生死觀，另一為國君的用人之道。前者主要表現在公孫杵臼、程嬰捨身報恩的情節上。像公孫杵臼、程嬰這些悲劇英雄均能在生死關頭展現出自身價值，維護人格尊嚴，他們高揚了生命力與時代精神。其他如趙簡子家臣董安于、趙惠文王相肥義，他們或為報主，或為救國；或自殺，或被殺，目的與結局不盡相同，但他們「為知己者死」的信念是一致的，這些都是司馬遷筆下的靈魂人物，也可以視為作者藉文化學術來展現自己生死觀的一種方式。

至於國君的用人之道，在本世家中司馬遷深懷「得賢者昌，失賢者亡」的無限興亡之感。趙國能在戰國中崛起，在於數位國君能提攜賢者。趙國在戰國中期能成為合縱的中堅力量，這固然有時勢和地理上的原因，也與趙國人才輩出，而統治者善於用人有著密切的關係。趙靈王死後，趙國慢慢式微，然國內尚有廉頗、藺相如、趙奢等一代英豪。趙惠文王尚能使賢任能，因此齊、秦等強國不敢對趙輕舉妄動；但惠文王以後的國君均昏庸無能，趙國從此以後就一蹶不振，尤以趙國末代國君繆王遷誅殺良將，自毀長城，趙國隨之滅亡，司馬遷在論贊上曰：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

文中語帶憤怒而哀惋，表現了司馬遷對昏君和小人的深切痛恨。

國君除了用臣得當與否會影響國家興亡外，立嗣不當，亦是造成國家動盪的重要因素，司馬遷在這方面著墨甚多，〈趙世家〉中的趙武靈王就是一個實例。

此外，國君徒具血緣關係而不思治國之道，亦難保住他既有的江山，這一點司馬遷藉左師觸龍游說太后，請以兒子長安君至齊為人質時發揮得淋漓盡致：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

左師觸龍所言，和明末黃宗羲〈原君〉的立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比黃宗羲早約兩千年，從中亦可看出司馬遷進步的國君觀，然而歷朝真正可以脫離這個災禍者又有多少呢？大多是悲劇發生時，這些王公貴族方能深刻地體會出，然為時已晚矣！

十四、魏世家

魏世家以平實的敘事有條不紊地展現了魏國如何從晉國崛起及其發展歷程。在敘述中。司馬遷似乎有意在凸顯前後期國君施政策略的異同，魏國興衰之緣由就在其中。

在魏的發展過程中，魏絳是一個關鍵人物，他是晉國的一個正直大臣，憑他的政治才華，為晉悼公「九合諸侯，戎、翟和」，因而提高了魏氏在晉國的地位，為日後的立國奠定了基礎。

魏氏數傳到了魏文侯，終於與韓、趙並列為諸侯。魏文侯是位賢君，他任用賢臣，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國能進入全盛時期，完全取決於國君的用人之道一禮遇賢者，謙虛為懷，這是司馬遷心目中理想的君主。與魏文侯互相對映的惠王，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對於惠王，司馬遷借孟軻的話加以評述：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魏世家〉）

文中表達出對惠王急功近利的強烈反感。司馬遷在〈自序〉中又說：「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與前期的魏文侯兩相對比下，魏國必然步上滅亡，此乃不可避免的事了！

此外，自惠王開始，文中收錄了許多縱橫家的說詞，充分展現出當時的國際現勢。這些立論周旋在合縱一主張六國同盟以抗秦，和連衡一六國分別以事秦上，其中亦有許多策士及為中飽私囊者而奔波。站在魏國的立場，司馬遷認為合縱方為保全之道，但梁惠王以後的國君的均缺乏遠見，隨著策士的鼓動而盲目輕信，導致在政策上搖擺不定，出爾反爾，這是當時六國的通病。對於強秦，司馬遷在本世家中借信陵君无忌之加以評述道：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

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同上）

面對這種局勢，信陵君的洞察力可以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魏國等卻一一墮入虎口，即使信陵君最後演出了「竊符救趙」，的感人情節，亦無法扭轉六國步上悲局的情勢。司馬遷於論贊中說：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近代學者李景星對此評述道：

未載信陵君上魏王書，無筆不轉，無語不透，尤為全篇出色處。蓋信陵於魏，有存亡關係，不用其人，而并棄其言，此魏之所以滅也。贊語云「雖得阿衡之佐無益」，以反語作結，正是太史公傷心處。（《史記評議》卷二）

這段評述，是否切中司馬遷的心坎，有待商榷。在這裡，司馬遷對於魏國國君的昏聩無能表現出一種無奈感，在當時不僅是魏君，其他各國何嘗不是侷限在短利中。即使有許多忠臣冒死以諫，到最後只淪為政治上的犧牲品，這是一種難以挽回的趨勢，它不是魏國的一個個案，所以六國被暴秦統一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悲局，即使魏國能得商湯時阿衡一般人才的輔佐，那又有什麼用呢？在這兒，司馬遷亦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天命觀提出了質疑，這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無奈，而對這種無奈，才是司馬遷真正的傷心處。

十五、韓世家

韓在戰國七雄中是相對弱小的國家，然處天下要衝，是秦進兵山東諸國的必經之地，也是山東諸國抗秦的主戰場，因而被挾持在秦、楚等大國間，處境十分艱難。

韓國在哀侯元年正式和趙、魏瓜分了晉國，二年滅了鄭國。元年，韓嚴弒其君韓哀侯，哀侯的兒子懿侯繼位，十二年後傳給韓昭侯。韓昭侯執政時是韓國歷史上少有的清明時期，以申不害為相，〈韓世家〉載：

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然而，申不害的政策在韓國並沒有被堅持下去，韓昭侯晚年即勞民傷財，內耗國力，屈宜臼就預示韓昭侯的下場：

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韓世家〉）

司馬遷在〈韓世家〉揭示，造成韓國失敗的因素除了地緣因素外，國家的流治者缺乏政治遠見，政策翻雲覆雨才是加速滅亡的重要因素。韓昭侯未克有始有終，繼位的國君們則朝秦暮楚，爭權奪利，宮廷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到公子咎與公

子蟣蟲爭為太子之際，韓國內政基本上已掌控在秦楚，有時是任楚、齊宰割，有時則淪為強秦的掌中物。

戰國末期，韓國的宗族出現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家－韓非，其學說成為秦國統一天下的主要依據，然在自己的國內卻遭到排斥，充分地展現了韓國政治的腐朽。司馬遷在〈自序〉中說：「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可見韓國日益衰亡，人為因素是為主因之一。

司馬遷身遭李陵之禍，「交友莫救」，因此對於歷史上能及時伸出援手的義行深表推崇。在〈韓世家〉中，司馬遷於篇末對韓厥為趙氏說情，並使趙氏得以延續宗祀一事特加以贊許：

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這種贊許，應該是其悲劇意識的昇華！

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從春秋期間陳國的一場宮廷之亂寫起，歷敘陳完奔齊後，他的子孫在齊國的蕃昌，全面展開了田氏篡齊和田齊由興到衰的發展歷程。在本篇中，司馬遷所強調的「順應時勢」和「用賢」是決定領導人物命運的主要關鍵。

春秋時代，氏族統治體系和公社共同體的社會結構逐漸在崩潰、瓦解，有眾多的氏族國家不斷地被吞併消滅，亦有眾多貴族保不住傳統的世襲地位，或不斷貧困，或「降在皂隸」。部分氏族貴族則拋棄陳規，他們以土地私有和經營商業為基礎，成為新興奴隸主階級，並迅速富裕壯大。〈韓非子愛臣〉：「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經濟上的強大實力使他們在政治上要求奪權，在軍事上要求兼併，終於使得周禮的流治秩序：天子→諸侯→大夫間的倫常關係徹底崩潰。在這段期間，凡能迎合這個歷史潮流者崛起，田齊就是一個代表；未能及時改變而固守原來制度者，往往就被淘汰，齊景公就是一個典型。司馬遷洞悉歷史就在這種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行進，然而他卻常引用民間傳述的占卜等預言去表達這種發展的必然性。本世家首尾均引述占卜結果來評述田齊，試觀末段之評論：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熟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厥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

這段評述展現了司馬遷對二律背反的掙扎，以財富為實力的新興奴隸主推翻氏族貴族的禮治，這是歷史發展潮流；但原始禮儀禮制中所保有的民主、仁愛、人道理念，勢必要被捨棄和吞沒，這又是司馬遷所惋惜的。所以我們可以體會他用「犯」、「專」等字眼來評田氏，用「非必」、「蓋若」來說明「勢之漸然」的無奈，充分體現了他觀察歷史發展後所引發的悲劇情懷。

十七、孔子世家

《史記》的周朝世家中以〈孔子世家〉作為終結，文中除了記載孔子一生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外，司馬遷高度地評價他的思想學說，對其坎坷周遊、困頓不遇的一生亦寄予極大的惋惜和同情。孔子是學者與執政者矛盾衝突的典型代表，其悲劇命運亦具有時代意義。

孔子是中國傳流思想的維護者，在春秋時代禮樂崩壞之際，他以百折不撓、鏗而不捨，「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奮鬥精神去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辯護、游說，結果在周游列國當中，到處碰壁，後來竟然絕糧於陳、蔡，幾臨餓死，孔子仍然「講誦弦歌不輟」，顏回準確地描述了他當時的心理：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世家〉）

司馬遷正是吸收了孔子的這種殉道精神，從孔子這種身處逆境而百折不回的奮鬥精神中吸取了巨大的創作力量，不管在寫〈自序〉或〈報任安書〉，都一直念念不忘「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的施政理念，就是中國傳統的那套禮制。這套理念他曾在魯國實施過一段時日，結果是：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孔子世家〉）

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在春秋戰國期間，各諸侯為了稱霸，不惜使出各種策略，瓦解鄰國的政權亦為首要之策。當孔子在魯國展現其政績時，最有憂患意識的就是齊國，〈孔子世家〉載：「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之，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結果魯國君臣終於抵擋不了誘惑而接受了齊國女樂，「三曰不聽政」，氣得孔子離開了魯國，且感傷地歌唱道：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這是〈孔子世家〉中第二度記載孔子對魯國的失望。第一次對魯國失望是數年前「季氏僭於公室，陪臣（陽虎）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所以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育為業。經過這一次的打擊，孔子終於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去周游列國，企圖再去尋找能展現自己抱負的地方，同時也開始了他的坎坷歲月。首先他先抵達衛國，雖受衛靈王器重，可惜馬上就有人「譖孔子於衛靈公」，住了十個月即離衛而抵陳國。經過匡時，被匡人誤認為是陽虎，差點罹難。後來展轉到曹、宋，在宋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孔子在周游的途中雖然遭受種種折磨與侮辱，但他對於

自己的理念仍然十分執著，坦然接受：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世家〉）

對於孔子不改變信念，不降低目標，絕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殉道精神，司馬遷更透過隱士們的勸導反襯出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世家〉）

然而，偉人總是寂寞的，春秋時代的潮流湮沒了仁政，仁政並不是禁不起考驗，而是禁不起諸侯間的弱肉強食，這一點司馬遷看得十分透徹，因此他雖懷著崇佩之情為孔子立傳，同時也為這位為鞏固傳統文化而淪為時代悲劇人物的遭遇寄予同情。孔子這種「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堅持，在「曲高和寡」的環境下，注定要成為歷史的悲劇人物，試觀〈孔子世家〉所引述老子和晏嬰對孔子的批評：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手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子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針對孔子的行事風格，司馬遷似乎以這兩段評述埋伏了孔子的命運，也隱藏著道統沒落的悲哀。孔子在外流落十四年，最後還是回到了魯國，魯哀公雖數度向他請教為政之道，但魯國終究不能用孔子，孔子也不求仕，於是傾全力整理傳統的典籍—《詩》、《書》、《禮》、《樂》、《易》和《春秋》的創作，這時候孔子對於推行仁政的理念開始動搖了。魯哀公十四年，叔孫氏的車伕鉏商獵殺了一隻麒麟，孔子有感而發：

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子世家〉）

再加上顏回也死了，孔子更感嘆道：「天喪予！」、「吾道窮矣」、「莫知我夫！」

第二年，子路又死在衛國，孔子也病了，當子貢去探望時：

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間，予始殷人也。」（同上）

七天之後，孔子就這樣走完了坎坷的一生，魯哀公誄之曰：

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同上）

然而子貢卻批評哀公：

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同上）

孔子的去世，代表著傳統道統的消失，司馬遷除本著悲痛的心情去刻劃這位理想傳統代表人物，更藉子貢對當世昏君作無情的反諷，周朝的十七篇世家就以〈孔子世家〉作為結穴，寄寓了司馬遷對東周一代的興衰之感，也對這位政治的理論家視為偶像，他於篇末讚嘆道：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肆、結語

周朝自春秋以後，穩定運行將近四百年的政治格局發生了裂變，原有的政治權威逐漸失落，原有的政治中心開始分裂，制度變更，權力下移。政治權威的失落，主要是社會結構的重組，同時也是統治階層自身的沉淪。自周桓王開始，由鄭莊公首先發難，此後不僅諸侯敢冒犯周王，連一些大夫也敢與周王一爭高低，大有牆倒眾人推的趨勢。周王朝威權一旦失落，導致並加速了國家政治中心的分裂。春秋初期，在原來不分上下的諸侯國中，開始形成了齊、晉、楚、秦等幾個大國，互相爭霸，號令小國，視天子為掌中之物。到了春秋末年，周王室不斷削弱、衰弱，其地位終於完全坍塌；與此相應，秦、齊、楚、魏、趙、韓、燕七個諸侯大國兼併小國，稱王稱帝，互相爭雄，各自為政，最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七國爭雄的局面，一個多元政治中心的格局於是完成。

隨著政治中心的分裂，諸侯亦先後孳生出新型的封建生產關係，一些卿大夫逐漸轉化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迅速地發展了自己的勢力，並策動和支持君主變法制。於是在各諸侯的變法運動中，世卿制轉變為宰相制，貴族世襲制轉變為官僚制和功能授爵制，分封制先後變為郡縣制。這些政治法構的轉變，標誌著社會轉型的完成，在各國的變法變制過程中，一些卿大夫逐漸控制了各國的政治。後來，由於士的崛起，有些卿大夫的手下，原本身分為士的家臣，也逐漸控制了卿大夫封邑的權力，於是在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乃至由「大夫專政」而轉變為「陪臣執國命」，政治權力就這樣下移了。

與政治權力下移相伴隨的是「禮崩樂壞」。禮樂制度的建立，本來就是為了加強維護等級制度和政治權威的，隨著舊有政治中心的分裂，舊有制度的瓦解，人們對於周王室，對於原本的禮樂也就慢慢蔑視，僭分名，越禮制之情事就屢見不鮮了，到處都在競爭，到處都有弑奪。史記世家前十七篇就展現了這些諸侯內部的變革過程和各國間的關係，糾葛著矛盾衝突，充滿血腥衝鼻的情節，其中所展現的悲劇意識可歸納如下：

一、忍辱負重的復仇精神

司馬遷於〈報任安書〉中說：「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這種悲劇意識亦展現在世家悲劇人物的身上，如：吳王報父仇、越王勾踐報國仇、范雎之報仇雪恥均是典型的代表，他們都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在忍辱的過程中，不僅引人憐憫，亦令人敬畏。

二、深情的宣洩和無奈的呼喚

儒家思想對情感的展現強調「中和」、「哀而不傷」，但是司馬遷卻以激情揭開春秋戰國時代的殘酷內幕，誠如李長之先生所說的：「周魯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到了司馬遷手裡，便都讓他樂就樂，哀就哀了！所以我們在他的書裡可以聽到人類心靈真正的呼聲！」⁶此外，對於悲劇人物無法逃脫命運，司馬遷亦一反常情而引述占卜、預言之談，其中即蘊藏著以理智觀歷史所顯現出的無奈，猶如他自己的遭遇，亦助長了《史記》的悲劇性。

三、殉道精神

悲劇人物為理念而奮鬥、犧牲是《史記》所歌頌的對象，孔子是一個典型。先秦世家以孔子作終結，除了肯定孔子的歷史地位外，亦肯定他獻身濟世，為堅持理念，甘願用自己的苦行去維護和傳播他所信仰的真理，其中蘊藏著歷史發展的無奈，但這段過程雖然艱辛，但卻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轉捩點。這種精神超越了芸芸眾生所沉浸的利欲深淵，體現了「末世奔利，唯彼奔義」的無私無畏精神。

四、悲劇意識的昇華

世家在描述各諸侯間的矛盾衝突中，貫穿著一個中心理念—德政才是治國的永續之道。司馬遷將悲劇意識淨化，而不是停留在悲憫、憤恨或無奈的層次中，這與司馬遷在列傳中將悲劇英雄的悲壯事跡轉化為陽剛之美的崇高特質，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附錄：世家中各侯國併吞表解

	國名	爵位	姓	始封	國都	滅期
1	吳	子（國語作	姬	太王子太伯	都於梅里	公元前 473 年滅於越

⁶ 參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 21。

		伯)			諸樊南從吳	
2	齊	侯	姜	太公呂尚	營邱	公元前 392 年被田和所篡；公元前 220 年滅於秦
3	魯	侯	姬	周公子伯禽	曲阜	公元前 249 年滅於楚
4	燕	伯	姬	召公奭	薊	公元前 221 年滅於秦
5	管		姬	文王子管叔鮮	鄭縣	春秋前已絕封,其地屬檜,檜滅屬鄭
	蔡	侯	姬	文王子叔度	蔡、新蔡州來	公元前 447 年滅於楚
6	陳	侯	媯	舜後胡公	宛丘	公元前 478 年滅於楚
7	衛	侯	姬	文王子康叔	朝歌、楚丘、帝丘	公元前 209 年為秦二世所滅
8	宋	公	子	殷後微子啟	商邱	公元前 286 年滅於齊
9	晉	侯	姬	武王子叔虞	大夏、絳(新田)	公元前 376 年為韓、趙、魏三家所分
10	楚	子	○	顓頊後熊繹	丹陽、郢	公元前 223 年滅於秦
11	越	子	姁	夏少康之子	會稽	公元前 334 年滅於楚
12	鄭	伯	姬	厲王子友	溱洧	公元前 375 年滅於韓
13	趙					公元前 222 年滅於秦
14	魏					公元前 225 年滅於秦
15	韓					公元前 230 年滅於秦
16	田(齊)					公元前 221 年滅於秦

參考資料

- 1.左丘明 1983 國語 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
- 2.田昌五 1995 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濟南。
- 3.田昌五、臧知非 1996 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西安。
- 4.司馬遷 1988 史記(百衲本二十四史)，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
- 5.朱光潛 1983 悲劇心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6.李長之 1980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灣開明書店，台北。
- 7.李寅浩 1991 《史記》文學價值與文章新探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8.周先民 1995 司馬遷的史傳文學世界 文津出版社 台北。
- 9.姜建設 1998 周秦時代理想國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
- 10.凌稚隆(輯校) 1968 史記評林，蘭臺書局 台北。
- 11.張蔭麟 1971 中國上古史綱，華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
- 12.張法 1991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 13.張大可 1994 司馬遷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
- 14.張大可等 2005 史記研究集成，華文出版社，北京。

- 15.張文澍 2008 元曲悲劇探微 中華書局 北京。
- 16.張其昀 1976 中華五千年史，華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
- 17.許蘇民 1992 歷史的悲劇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18.陳曦 2000 孔子神韻的獨特演繹：《史記·孔子世家》探微 鄭州大學學報 第3期。
- 19.陳桐生 1996 史記名篇述論稿，汕頭大學出版社，汕頭。
- 20.雅斯培著，葉頌姿譯 1974 悲劇的超越，巨流圖書公司，台北。
- 21.黃鎮偉 1999 歷史的黃鐘大呂—史記，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
- 22.楊樹增 2004 史記藝術研究，學苑出版社，北京。
- 23.楊寬 1999 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24.楊寬 1998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25.楊建文 1994 中國古典悲劇史，武漢出版社，武漢。
- 26.裴駟、司馬貞、張守節 1975 史記三家注，洪氏出版社，台北。
- 27.熊道麟 2002 從《史記》人物行迹探討孔子天命觀的生命主體創造價值—以項羽、張良、藺相如為例 興大中文學報第14期。
- 28.鄭樵生 1993 司馬遷的世界 志文出版社 台北
- 29.劉榮傑 2008 史記悲劇意識發微 2008 南台灣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30.賴明德 1983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洪氏書版社，台北。
- 31.錢鍾書 1978 管錐篇，蘭馨出版社，台北。
- 32.韓兆琦 2008 史記講座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 33.韓兆琦 2008 史記題評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
- 34.韓兆琦 1996 史記通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桂林。
- 35.魏聰祺 2001 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36.羅世烈 1990 秦漢史話，貫雅出版社，台北。

**The Study on the Tragic Fate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y
Ssu Ma-Chien –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on**

Chou Dynasty

Liou , Rong-Jye

Associate Professor, Meiho University

Abstract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y Ssu Ma-Chien had described two groups: one was the feudal lords of Chou Dynasty, the other was the feudal lords or vassalages of West Han Dynasty. There were three special articles: Biographic Sketch of Confucius. Biographic Sketch of Chen Sheng and Biographic Sketch of the power group of emperors' mother or wife. Ssu Ma-Chien had given them the high ranking by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y.

The relation between Biographic Sketches of Emperors and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was close, they not only created each other but also contradicted each other too on Chou Dynast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403-221 B.C.), the historical stage was full of tragic events, the former 17 articles of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had expressed the change course of every Feudal Lords and their relations, then closed by Biographic Sketch of Confucius. This article has inducted the tragic spirits on the feudal lords of Chou Dynasty as the following : 1.To endure the insult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important mission 2.To reveal melancholy and cry out 3.Martyrdom 4. Catharsis of tragic Consciousness . From those tragic spirits , we can find that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Ssu Ma-Chien not only stayed in the level of sad feelings but also changed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into the strength of seeking ideas .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express the conflicts between emperors and their subordinate official or relatives. Ssu Ma-Chien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felt indignant at the justice which expressed the characters of tragic hero.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also expressed the deep tragic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writing of Ssu Ma-Chien.

(Keywords :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eudal Lords , Conflicts , Tragic Fate , Martyrdom , Catharsis)